

南西伯利亞早期遊牧王國王族墓地的景觀、布局 and 形制

郭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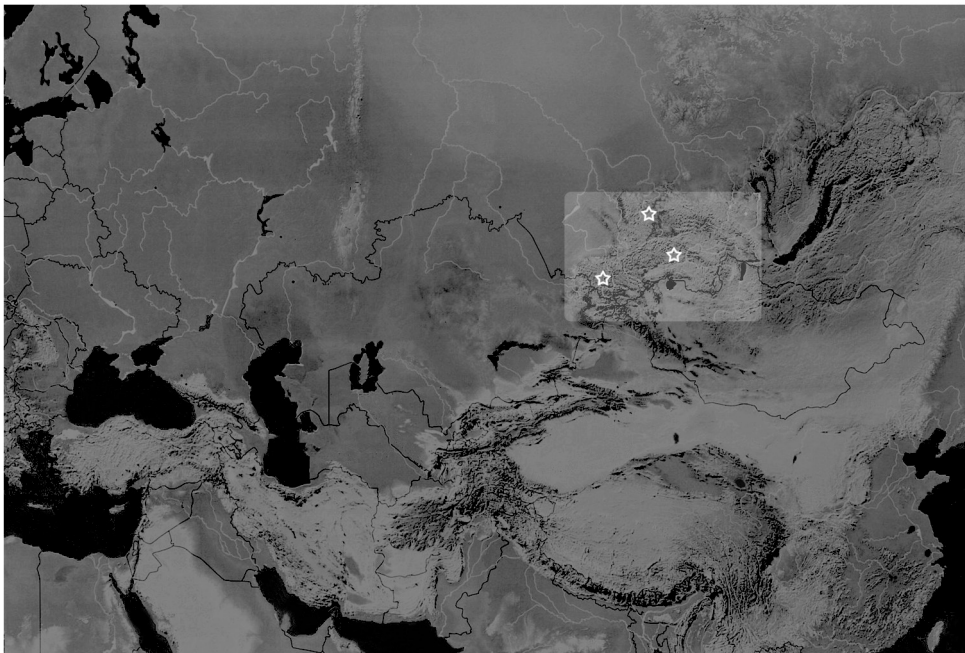
南西伯利亞是歐亞草原遊牧化最重要的地區之一。在這個山地遊牧經濟出現較早、發展迅速的地區出現了幾個早期遊牧王國，大致對應三個考古學文化，分別為艾迪拜爾文化 / 烏尤克文化 / 三道海子文化、塔加爾文化和巴澤雷克文化。這些歐亞草原上的早期遊牧王國幾乎都會選擇一個相對封閉的谷地作為首領及其家族的墓地。這些王族墓地選址均位於文化分布最為核心的安全之地，基本都處於谷地之中，和周圍景觀融為一體。墓地基本遵循線性布局，三道海子文化大致遵循大範圍東西向線性分布，局部鏈狀分布，塔加爾文化大致為南北向鏈形片狀分布，巴澤雷克文化則為緊湊型的南北向鏈狀分布。首領家庭的墓葬規模宏大，有中、小型的墓葬陪伴周圍。墓葬均有封堆，形制結構複雜，都有大型木構的槨室。隨葬器物類別多、器類全、質地高檔珍貴，多使用黃金製作器物或者金箔裝飾器物，大多出土反映本文化特色、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器物 and 裝飾主題，動物風格藝術主題在其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三道海子文化是墊蹄尖金鹿、蜷曲或者垂足雪豹、垂足野豬的器物或者紋樣，還有圓錐狀金耳墜、金項圈、金柄木勺 and 鍍形金器。塔加爾文化是裝飾站立圓雕山羊的鐘形權杖首 and 鹿飾件。巴澤雷克文化早期是鷹 and 虎，之後是各種造型格里芬的器物 and 裝飾紋飾。三個文化都相同的威權器物是以管銚斧、短劍 and 弓箭為代表的武器，以及各式腰帶、馬具 and 銅鍍。這些器物或者是藝術主題成為早期遊牧王國最強有力的文化因素，維護着王國的強勢存在，並在周圍的文化中廣泛傳播。三道海子文化、塔加爾文化 and 巴澤雷克文化的興衰有時代早晚、東西地域之分，加上公元前 2 世紀早期匈奴的擴張，反映了南西伯利亞地區公元前第一千紀軍事、政治 and 文化的互動 and 權力中心的變遷。

公元前第二千紀後半期到第一千紀的前半期，歐亞草原青銅時代末期的社會正在經歷經濟

和社會遊牧化的巨變，即原來以畜牧—農耕經濟為主的社會開始採用遊牧經濟的方式。這是一個動態非均衡的過程，在不同的地區和文化中，由於各種原因，演化的速度和程度有所不同。

遊牧經濟導致遊牧社會的興起。遊牧社會其間，不同部落更容易結為聯盟，代表軍事力量的戰鬥力和機動性顯著提高。因此，與遊牧化相伴發生的，是草原社會的複雜化。比如卡拉蘇克文化時期（公元前 14—前 8 世紀），在南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騎馬開始普遍，人群移動性增強，依托山地、按季節變化遷徙的遊牧業發展起來，墓地中的大型墓葬（直徑 40—100 米）和中小型墓葬的差別顯示男性的階層分化。^[1] 歐亞草原上開始出現了統治廣大區域的早期遊牧王國。這些社會往往有中心區域，在中心區域可以發現領袖、防禦功能、對自然資源的控制、手工產品、貿易和交換、祭儀等存在的跡象。^[2] 這些王國的首領開始修築巨大的塚墓，而且都選擇一個特殊的區域來修建王族（統治集團）的墓群。

從迄今的發現與研究看，生活在以阿勒泰—薩彥為中心的地區的人群比較早就開始遊牧經濟的嘗試，南西伯利亞是歐亞草原遊牧化最重要的地區之一。^[3] 在這個山地遊牧經濟出現較早、發展迅速的地區出現了幾個早期遊牧王國，大致對應三個考古學文化，分別為艾迪拜爾文化 / 烏尤克文化 / 三道海子文化、塔加爾文化和巴澤雷克文化（圖一）。這些歐亞草原上的早期遊牧王國幾乎都會選擇一個相對封閉的谷地作為首領及其家族的墓地。學界一般把這些早期遊牧王國的王族墓地稱之為“國王谷”，因此，本文所論即南西伯利亞的三個國王谷。





圖一 俄羅斯南西伯利亞公元前第一千紀遊牧王國的三個國王谷及相關墓地（下圖底圖采自谷歌）

本文著眼于南西伯利亞三個考古學文化的王族墓地的比較研究，圍繞墓地的選擇和布局、景觀、墓葬的規模和形制、代表文化意識形態的高規格隨葬品等，探討這些國王谷的墓葬在歐亞草原遊牧化及社會複雜化過程中的作用和意義，同時根據出土文物，分析三個早期遊牧王國勢力的消長變遷以及不同的黃金消費方式。希望拋磚引玉，推進學界相關研究更上一層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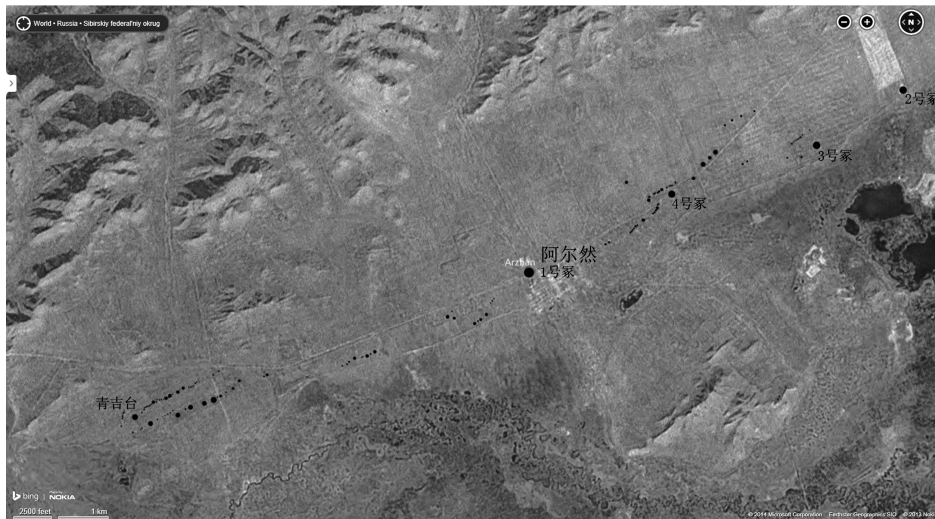
一、烏尤克谷地王族墓地的景觀、布局與形制

從迄今的考古發現看，蒙古中西部地區、俄羅斯圖瓦和中國青河、富蘊縣是早期遊牧社會率先發展的區域。圖瓦發現幾千座沒有隨葬品的石構墓葬，時代和卡拉蘇克文化相當（公元前15—前8世紀）。一般稱為“蒙岡—泰加類型”（Mongun Taiga type），或者把創造這些遺存的人群稱為“阿爾然部落聯盟（Arzhan tribal union）”。其墓葬特徵是有環列石，有的環列石直徑達100米，其中的石構輻條從4至32根都有，像一個太陽盤或者是車輪。墓葬中央為石砌墓室，建于地表，周圍一圈石板圍牆，然後覆蓋一層石塊，出土器物非常少。大約公元前7世紀，這個地區出現一個文化，被稱為艾迪拜爾文化（Aldy—bel culture，這個名稱為聖彼得堡的考古學術機構命名，莫斯科的考古學術機構稱之為“烏尤克文化”，我們稱之為“三道海子文化”^[4]，以下均稱為三道海子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性器物是圓錐形的耳墜。^[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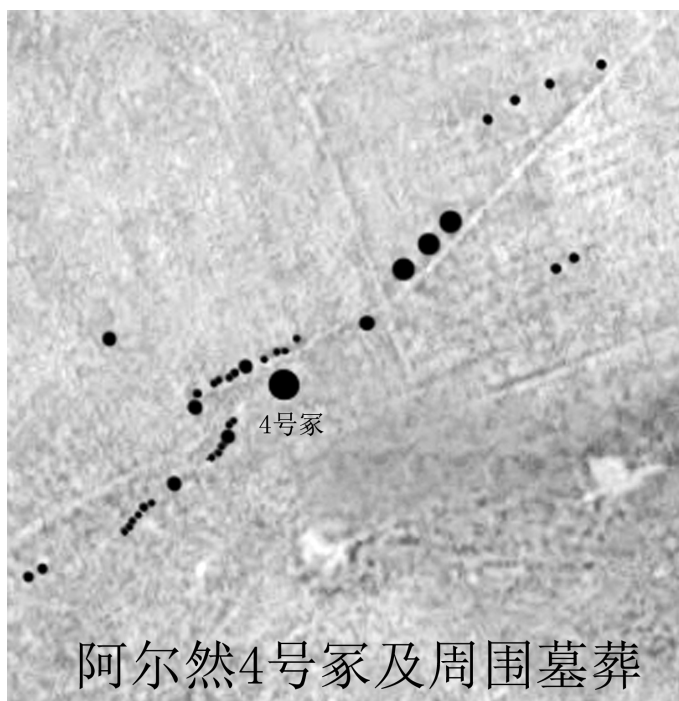
這個時期的人群可能建立了草原上的早期國家，在俄羅斯圖瓦烏尤克盆地發現一個被稱為

阿爾然的“國王谷”。國王谷是一個東西向楔形的河谷，西部狹窄，周圍被西薩彥嶺和唐努山所封閉，向東漸漸開闊，中間為葉尼塞河的支流烏尤克河。這個河谷分布着幾百座大小墓葬，從東向西大約呈直線分布着至少 7 座大墓（圖二）。這些大墓應當是前述三道海子文化首領王族們的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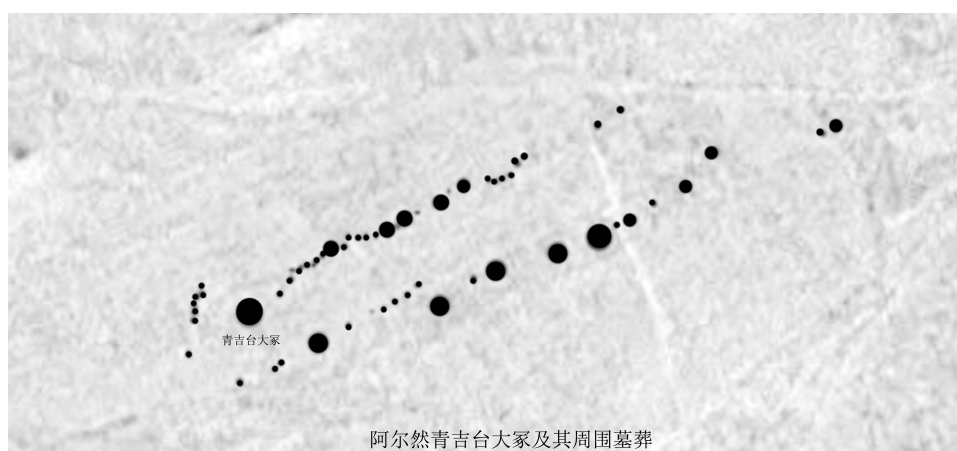
最大的阿爾然 1 號塚位於阿爾然村西北角的農場裏。1971—1974 年，格拉茲洛夫（M.P.Grjaznov）率隊發掘此墓，發掘前墓已被盜，出土遺物很少。修建木槨的木頭部分留了下來。1 號塚在整個阿爾然國王谷中顯然處於居中的位置。塚的結構非常特殊，為地面壘築的放射狀木構多寶格式建築，直徑 80 米。埋葬結束後，上面再用片石封蓋。封堆高 4 米，直徑 120 米。約有 160 匹帶鞍的馬埋的古塚裏，根據殘存遺物可知另有約 300 匹馬在葬禮的儀式中被吃掉。由於被盜，大部分槨室都是空的（圖三）。俄羅斯專家最新測年的結果是公元前 9 世紀末至前 8 世紀早期。^[6] 東南方向是這個文化最重要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1 號塚東南約 4.5 公里處有一東北—西南向的低山，低山山峰和 1 號塚東南的主方向相連，應當正好對着冬季日出的方向。這不知是當時人有意選擇，還是偶然形成。



3、阿爾然谷地 1 號塚西部墓葬分布示意圖



2、阿爾然谷地 4 號塚及其附屬墓葬分布示意圖



4、阿爾然谷地青吉泰大塚及其附近墓葬分布示意圖

圖二 俄羅斯圖瓦共和國烏尤克國王谷墓葬分布圖（底圖采自必應）

2000 年至 2003 年，俄羅斯聖彼得堡埃爾米塔什博物館的西伯利亞分館和德國考古學院的歐亞考古研究所合作發掘了阿爾然 2 號塚。這是最靠東，也是最小的一座大塚，年代比 1 號塚要晚，大約公元前 7 世紀末。塚墓直徑為 75—80 米，高 1.5—2 米，石塊夾泥的封堆內部地面邊緣有一圈列石圍出的矮石牆，有的段落能分出兩圈。墓塚週邊分布很多的祭祀石圈和石堆。

封堆下的地面朝東南有一條黃土道路，中心東南有一個較大的殉馬坑。塚週邊圓形祭祀坑，

內埋焚燒過的動物骨架，可辨認的為羊。石牆裏面的一些石塊上面發現有岩畫。墓葬的北側立了兩塊鹿石。在封堆中央靠西的位置有兩個空的大長方形坑。這兩個空坑北部有一個土坑木槨墓，編為5號墓坑，夫婦合葬，側身屈肢，隨葬了5600件金器，屬於頭冠、衣服墜飾、首飾、武器等。除了主墓室，列石與封堆之間分布不少小的墓葬，石圍下也分布不少墓葬和馬具埋藏點。石圍牆下有4座男性墓、1座女性墓，男、女墓主頭上有傷痕，可能是人牲。

考古學家還注意到一個現象，以5號墓室男女墓主中間為界，可能存在一條縱貫整個大塚的軸線，其延長線剛好可以把整個2號塚分為東西兩部分，東半部分分布的殉馬坑，殉葬人等都反映出男性的特色，與此相對，西半部則是女性的特點。看來，男女性別的區分在墓塚的布局中得到了仔細的考慮（圖三）。^[7]

2號塚西側約2公里，為阿爾然3號塚。它與2號塚沒有發掘之前相近，規模更大，封堆直徑達90米，高約3米。它的西側3.5公里處還有一座，編號為4號塚，除了墓塚周圍的祭祀遺址外，與其它幾座大塚不同的是，4號塚西北側呈線性分布着不少中小型的塚墓。4號塚和西部的1號塚相距約3公里（圖二，1—3）。

阿爾然1號塚的西面還有四大片墓群。這些大小不等的塚，成若干線性排列。開始兩片墓葬規模不大。最西邊的兩列墓葬規模較大，呈東西向鏈狀分布，都有和東邊大墓規模相似的大塚。楚古諾夫正在主持發掘的是靠北一列最西的一座，稱為“青吉台大塚”，應當算是整個阿爾然墓群最西邊的大墓，和東部的2號塚遙相對應。東距1號塚5.5公里。直徑90米，高3米左右。從剖面上可以看到，封堆由兩層沙土和兩側石塊交叉堆成。封堆邊緣用石板橫砌，週邊堆青灰色淤泥。列石兩側通過堆石塊來加固。塚的結構與阿爾然2號塚相似，有鹿石、列石和封堆。但是也有一些獨特之處，一是在封堆外緣原始地面上堆若干層湖泊的淤土；二是周圍挖一圈壕溝，在溝底也堆了一層湖泊淤土，時代可能為公元前6世紀（圖三）。^[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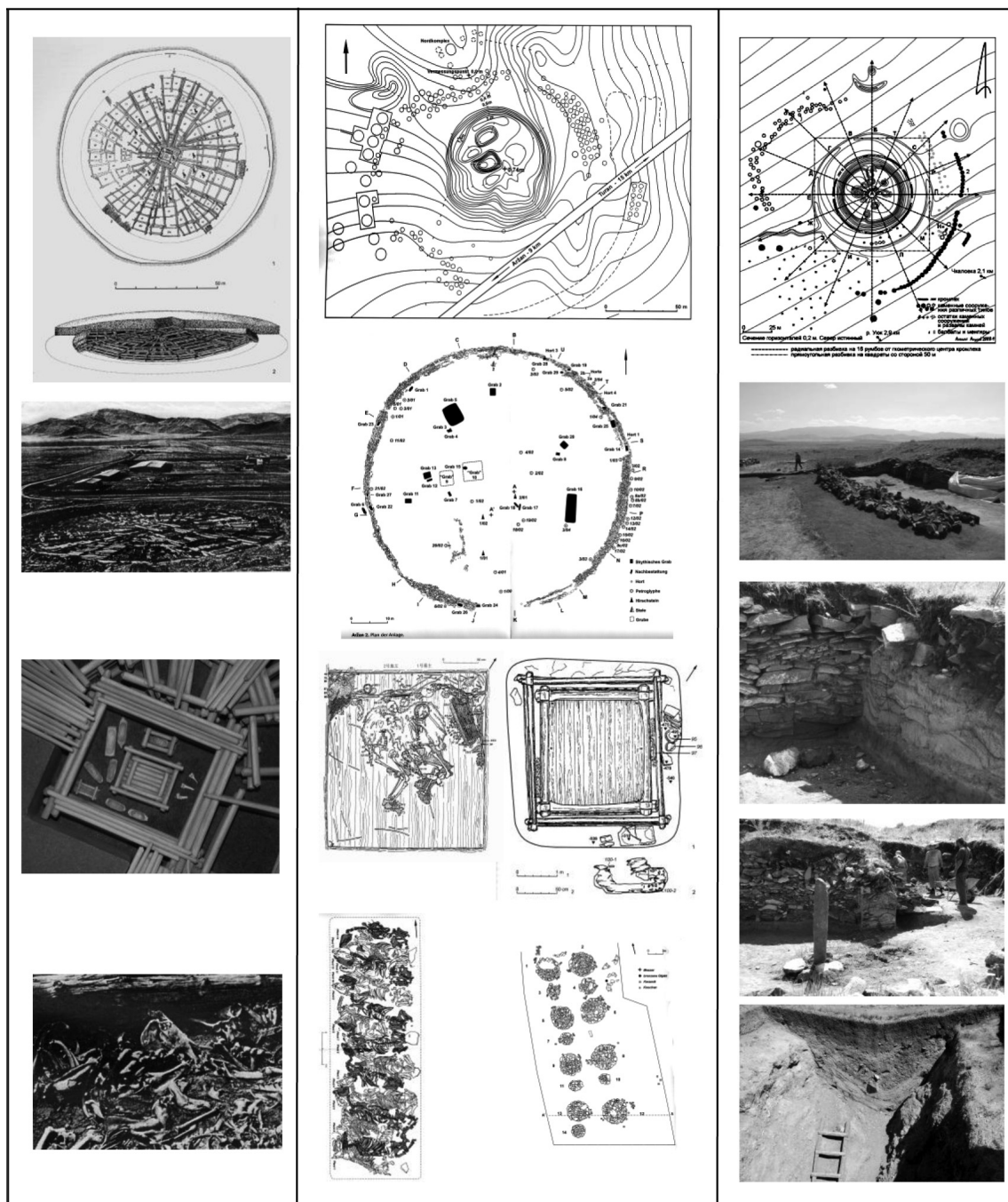
從1號塚到2號塚，除了片石夾泥土壘出的扁平封堆、西北—東南的主方向、原木搭建木槨、鹿石、動物風格藝術一脈相承外，在墓葬形制方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號塚在地面上架壘的向心多格木結構、獨木棺等因素消失，出現地面以下的墓坑。從地表跡象看，除了4號塚周圍中小型塚的布局特殊一些外，2、3、4號塚的形制布局基本相似，青吉台大塚除了圍墓溝及使用淤泥以外，和東部的這幾座大塚也形制相近。從布局看，最西邊的這一大組墓葬和1號塚東邊的不同，以青吉台大塚為首，向東北方向分出了兩排，南部一排大墓較多，北部的一排數量和規模稍遜。南北兩排中的大塚和青吉台大塚相差不大，可能身份地位相似。不像東邊大塚之間相隔較遠，這一組大塚相互之間距離不遠，而且似乎有特別的安排，顯示了這些大塚之間密切的關係（圖二，4）。其間到底是什麼關係，為何與東部大塚分布不同，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變革，具體情況可能只有待將來的發掘了。

總之，這些墓葬布局和結構的變化說明文化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之上，發生了階段性的變遷，除了自然漸變外，文化演變的背後也可能存在着統治集團不同支系、團體、階層之間和社會不同部落之間的劇烈變動。

阿爾然 1 號塚

阿爾然 2 號塚

青吉台大塚



圖三 阿爾然 1 號、2 號、青吉台大塚形制比較圖

從地理位置和生態環境分析，早期遊牧王國是經過精心考察後才選擇阿爾然谷地作為王族墓地。當時人的風水意識今天不得而知，但烏尤克谷地作為王族墓地來說，至少滿足了封閉安全、水草豐美的牧場、景觀悅人的要求。從現在的生態條件看，烏尤克谷地北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南北相距不遠，隔着西薩彥嶺，但圖瓦谷地比米努辛斯克盆地要乾燥得多，米努辛斯克盆地雖然緯度高，但植被很好，薩彥嶺覆蓋着非常茂密的森林，這種森林連地表都長滿了各種植物。到了圖瓦境內，薩彥嶺最後的南坡，森林覆蓋率驟減，很多地方只生長草。顯然，薩彥嶺山地以及茂密的森林分隔了米努辛斯克盆地和烏尤克谷地，使這個相對封閉的谷地成為一個較為安全而又平靜的地方。薩彥嶺以南直到南部的阿爾泰山東南支脈都直接在王國力量的控制之下，周圍不同社會的人群或者是軍事力量很難深入此地。這保證了王族墓地的安全。三角形的谷地周圍都是山脈，其北、西和南部基本為山脈所圍閉，南部山脈有狹窄的河流谷地通向葉尼塞河上游，只有東部為寬敞的開口。不過谷地東部出口部位整個地勢較高，甚至還有一些小山丘，使整個谷地和外界在視野上隔斷開來。阿爾然墓地南部，烏尤克河的北部還有一片單獨分布的山體，也使墓地更加處於在一個相對廣闊，但周圍都有多層次自然屏障的保護之中，中間有河流蜿蜒流過，其間還點綴一些湖泊，本身就是水草較好的牧場，景觀非常寧靜幽美（圖一、圖二）。

二、薩貝克谷地王族墓地的景觀、布局與形制

米努辛斯克盆地中心的薩貝克谷地是塔加爾文化的國王谷。塔加爾文化是南西伯利亞早期鐵器時代文化，分布於俄羅斯葉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和克麥羅沃州東部，年代約為公元前 10 世紀末—公元前 1 世紀，前接卡拉蘇克文化，後續塔施提克文化。^[9] 格拉茲羅夫最早建立了這個地區的文化編年。^[10] 根據新的測年資料，塔加爾文化新的編年如下：巴伊諾夫期（Bainovo，公元 10 末—前 8 世紀）、波德格爾諾夫期（Podgornovo，公元前 8—前 6 世紀）、薩拉戈什期（Saragash，公元前 6—前 3 世紀）和捷西期（Tes'，公元前 2 或前 1 世紀—公元 1 世紀）。調整了原來的文化編年，文化系列沒有改變，就是早期時代提前了近 200 年。^[11]

總的說，塔加爾文化的墓葬的演變趨勢是規模和深度在增加。石板圍成的墓葬漸漸被木結構的或者是多層的木板結構的墓葬代替，早期墓主仰身直肢，一般頭朝西南，很少朝東北。二次合葬墓數量在增加，頭向不定。從薩拉戈什期開始，能看到更精緻的葬儀和超級墓葬結構。墓圍從 2 米到 300 米都有，由 8—20 塊石頭建成兩個或者更多方形的二次葬墓室。通過特別的入口，墓室中葬的人能達到 200 個。有一些高級別的男女墓主葬在單獨的墓中。孩子們單獨葬于小石箱裏或者和婦女二次合葬。社會分層比較明顯。從捷西期開始，社會有了顯著的分化，墓葬仍然有巨大封堆，四角有柱石。中間有 30—50 米見方，3 米深的墓室，墓室用圓

木精心搭成兩層。頂部蓋圓木和樺樹皮，墓室中葬幾十個個體。墓主頭骨都經過環踞或鑽孔，均有火祭。^[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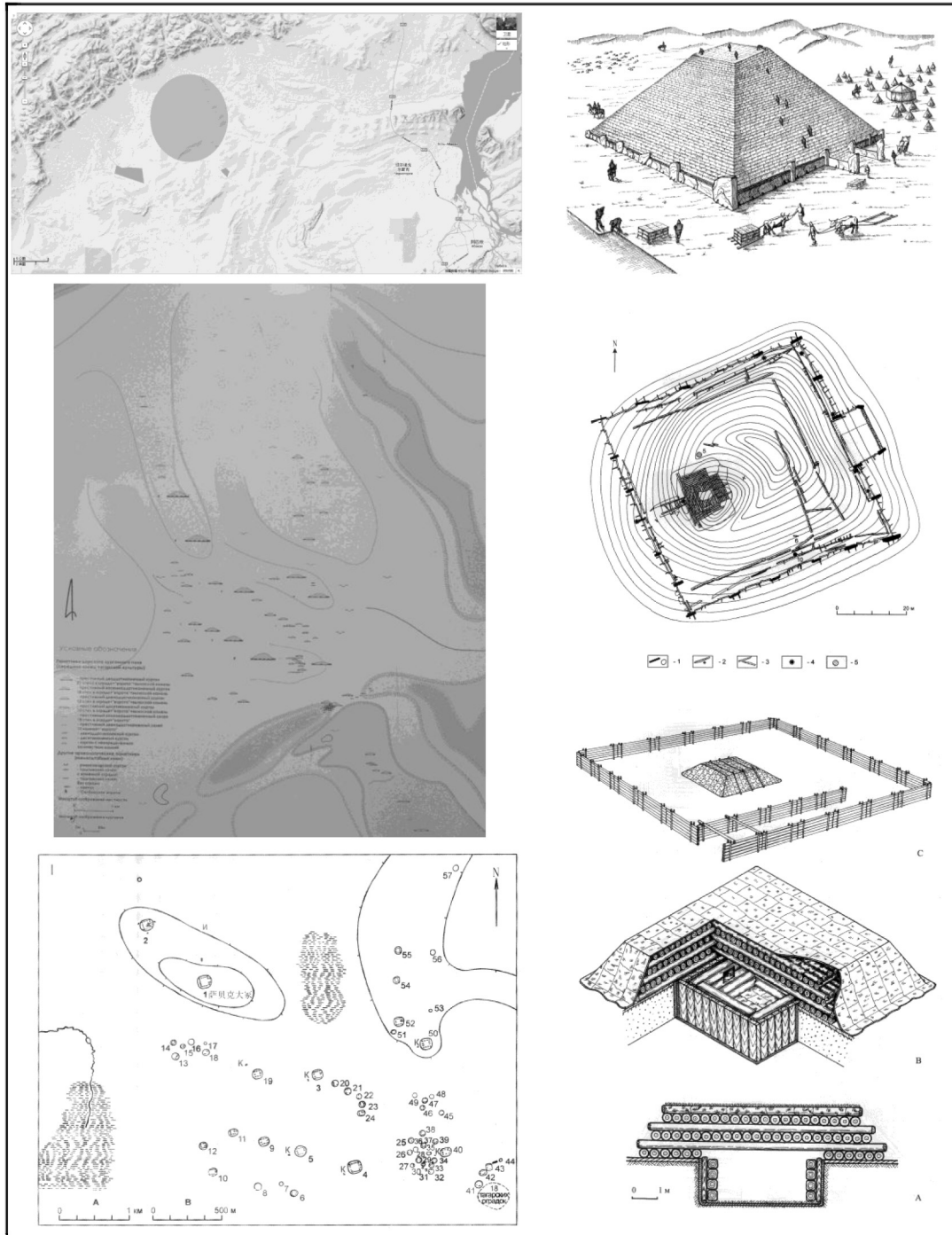
塔加爾文化的國王谷在米努辛斯克盆地中心薩貝克谷地，位於阿巴坎西北部 60 公里的巴提涅沃（Batenevo）山嶺的山前地帶。這塊半封閉的草原顯然被塔加爾文化的統治集團選作大小首領的墓區，草原的西北部為巴提涅沃山嶺，山前地帶為一個巨大而又平緩的谷地，東南部有不高的山梁圍抱墓地，正對墓地有一個缺口，像門一樣。東部有一條稍微高出周圍地區的高地。這些高地圍出一個廣闊的谷地。東部高地的北側梁上立着兩塊巨石，一塊約有兩人高，另一塊約有一人多高，相距很近，就像是一道石門。石門以外是漸漸低凹下去的草原，但沒有墓葬，石門以內就是塔加爾文化的國王谷。大草原上略高於周圍的臺地上星羅棋佈大小不一的塚墓。國王谷內分布着大型塚墓 20 座，中型墓有 100 多座，巨塚大致也呈鏈狀分布略呈西北—東南方向，每個大塚周圍有中、小型的墓葬，但相互間的離的較遠，呈片狀分布（圖四）。

最大的是大薩貝克塚（Bolshoi Salbykskii）。塚墓確實很大，大致呈正方形，邊長 70 米，原高 14 米左右，發掘前高 11 米，為西伯利亞最大的塚墓。二十世紀三十年代，S.V. 吉謝列夫發掘了這座大墓。四邊豎立一圈巨大的大石板，大石板之間有橫立大石板，每塊重 50 噸，高 6 米。在東牆內的橫向石板還壘了木頭。其它三面牆都沒有。門向東北，門道入口為兩排豎立的高大石塊。墓葬和墓道中軸線的西段為墓室，東部墓室 5 米見方。雖然被盜，還是有 7 具人骨架、金箔殘片和銅刀殘留下來（圖四，右側圖）。從其規模看，這應當是塔加爾文化首領的墓葬。^[13]

第二大的被稱為小薩貝克塚。該塚沒有發掘。四邊立巨石，共 20 塊，每塊重約 30—40 噸。邊長 50 米左右，高 7 米。東側也有門道，但是已經完全被塌下的封土覆蓋，整個塚墓呈金字塔形，中間已經塌陷，可能已經被盜擾。

米努辛斯克盆地由葉尼塞河中游以及丘雷姆河（Chulym）上游河谷組成。盆地海拔 300—350 米，三面環山，西邊是庫斯內次山脈（the Kuznetsky Alatau）和阿巴坎山脈（the Abakan range），南部是西薩彥嶺，東部是東薩彥嶺，山區覆蓋着茂密的森林，盆地裏則是草原。西薩彥嶺森林茂密，其間有山間河流。但是樹木非常稠密，林中佈滿灌木，非常不利於人類的通行，這對古代的交通是非常大的一個難題。在古代主要通過西北角草原森林景觀的通穆—丘雷姆走廊地帶（the Tom—Chulym corridor），聯繫着阿勒泰和哈薩克斯坦地區，西南方向還可以通過阿斯科茲河（the Askiz River）。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人群相對閉塞，甚至和最近的鄰居都難於互動，只能通過這些有限的、艱難的山間通道和外部世界聯絡。^[14]以米努辛斯克盆地為核心的地區是南西伯利亞重要的文化中心，由於氣候和生態較好，而且金屬礦產資源豐富，因此自阿凡納羨沃文化、奧庫涅夫文化、安德諾羅沃文化、卡拉蘇克文化至塔加爾文化均非常發達。塔加爾文化的國王谷正處於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中心位置。

這個谷地除了國王谷的墓群外，在阿巴坎周圍的草原上還有一些巨大的塚墓，三五成組，



圖四 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加爾文化薩貝克國王谷位置、墓葬分布及薩貝克大塚結構示意圖

從規模看，這些墓葬比薩貝克谷地的大墓稍小，可能屬於第二等級的人群。近年發掘了一座大塚，就在阿巴坎市北邊不遠的丘陵草原上，名為巴列茨基勞格。形制和薩貝克大墓相似，只是規模略小，每邊長 53—54 米，牆高約 2 米。門道在東側，高 1.5m，兩側立巨石。這座大塚只有一個墓坑，周圍也沒有犧牲坑，已被盜擾。

三、烏爾蘇爾谷地王族墓地的景觀、布局與形制

阿勒泰地區的墓葬存在較強的地方特點，被命名為巴澤雷克文化（the Pazyryk culture）。^[15]除了卡通河流域^[16]，這種文化在北部山區^[17]，蒙古西南^[18]都有分布。公元前 6—前 3 世紀，在戈爾諾—阿勒泰同時共存着巴澤雷克文化和卡拉科巴文化（the Kara—Koba culture），巴澤雷克文化可能處於主導地位。巴澤雷克文化和卡拉科巴文化青銅時代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卡拉庫爾文化（the Karakol culture）。^[19]公元前 8—前 7 世紀，戈爾諾—阿勒泰可能有兩種人群，奎尤姆（the Kuyum）在北部和中部，葬于石堆下的石棺中，相對的是較為土著的人群。^[20]闊克薩（the Koksa）生活在南部和中部，葬于石圈或者是有圓圈圍住低矮石堆下的圓形土坑中。^[21]前者可能是創造卡拉科巴文化人群的祖先，後者可能是巴澤雷克文化的祖先。^[22]



圖五 烏爾蘇爾河流域的巴澤雷克文化墓地分布圖（底圖采自穀歌）

根據各種資料，巴澤雷克文化主要墓葬的年代大概為：巴沙達爾發掘的墓葬約公元前 6 世紀，圖埃克塔 1 號塚約公元前 440—前 400 年，巴澤雷克 2 號塚約公元前 300—前 282，巴澤雷克 3 號塚約公元前 299 年，此墓出了絲綢製品，巴澤雷克 1 號塚約公元前 295 年，巴澤雷克 4 號塚約公元前 264 年，巴澤雷克 5 號塚約公元前 250 年。^[23]

一般認為巴澤雷克文化分為三期，第一期以邁埃米爾墓葬為代表，也被稱為邁埃米爾期，第二期以巴澤雷克墓地為代表，稱為巴澤雷克期，第三期以希別墓地為代表，稱為希別期。有的學者也把三個期看做不同的三個文化，還有的學者在此基礎上做了新的分期研究，第一期以邁埃米爾墓葬為代表，時代為公元前 8—前 6 世紀，中期為公元前 5—前 4 世紀上半，以阿克阿拉哈 1 號墓、圖埃克塔 1 號塚、巴沙達爾 2 號塚為代表，晚期為公元前 4 世紀中—前 3 世紀，以巴澤雷克 1、2、5、6 號塚，別列爾 11 號、烏闊克 27 號墓為代表。^[24]



圖六 圖埃克塔墓地墓葬分布圖（底圖采自必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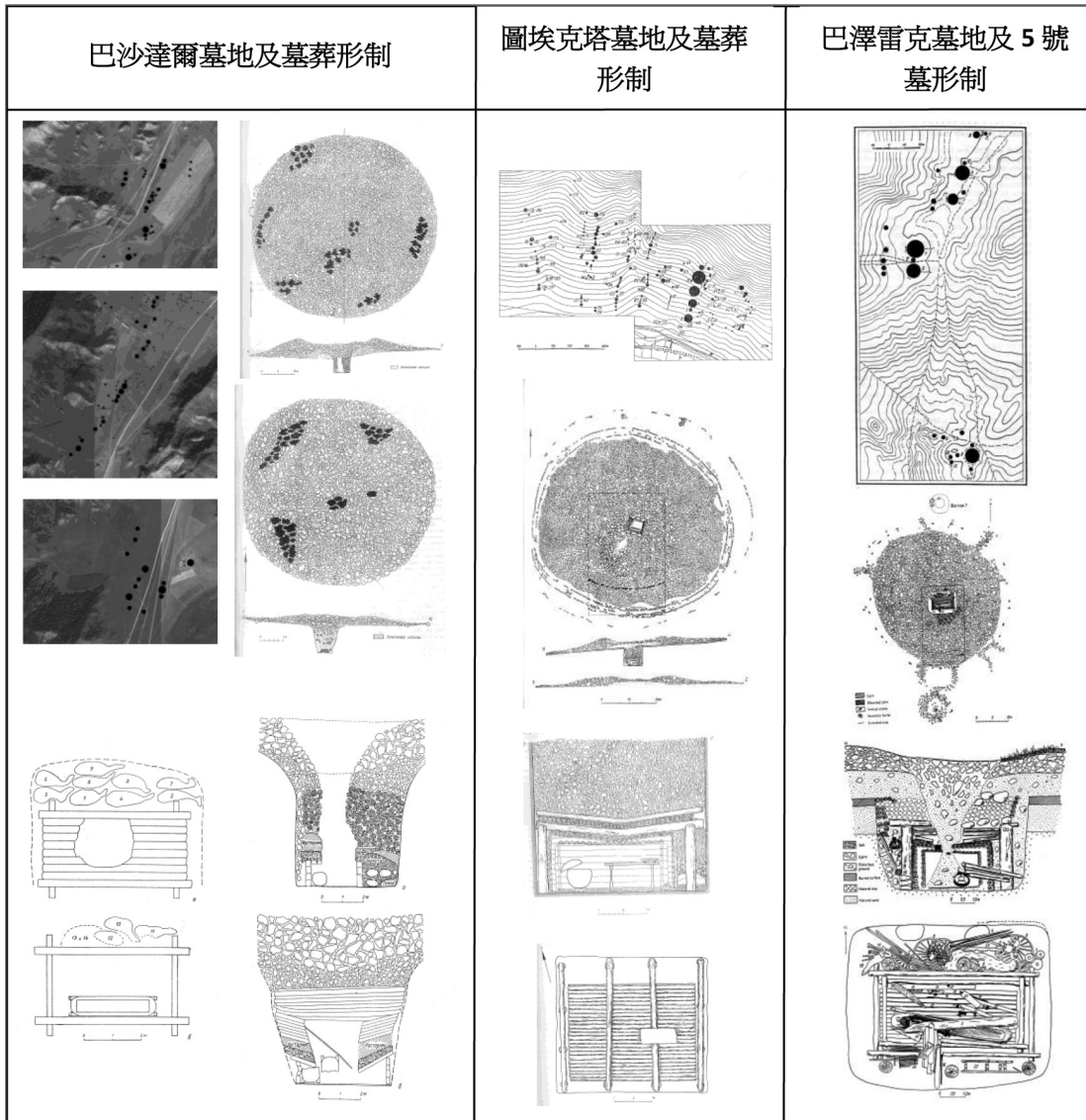


圖七 巴沙達爾墓地墓葬分布圖（底圖采自必應）

巴澤雷克文化以巴澤雷克墓地命名，巴澤雷克墓地也因此非常著名。巴澤雷克墓地共有 5 座大墓，布局不太遵循鏈狀分布規則，5 號塚離其它幾座較遠，但出土器物最為豐富。巴澤雷克墓地的墓葬一般堆石為塚，大約高 1.3—1.7 米，直徑大約在 36—46 米之間，四號墓直徑只

有 24 米，石堆下是豎穴土坑，墓坑用長松圓木裝飾四壁。值得指出的是，巴澤雷克墓地無論墓地規模還是單個墓葬的規模在巴澤雷克文化中都不算是最大的（圖八）。^[25]

迄今發現巴澤雷克文化墓葬最密集的地區是卡通河的支流烏爾蘇爾河 (Ursul) 流域，河道全長 130 公里，流域面積 3,600 平方公里，發源自捷列克塔山，河水主要來自雨水。這個區域差不多在阿爾泰山地區的中部，烏爾蘇爾河像卡通河蔓延出去的一支彎彎的蔓藤，河谷地帶像一輪彎月，東部連着卡通河，西部是群山，河流北邊希別墓地東部不遠有一交通便利的谷地通向戈爾諾阿勒泰市，從那裏沿卡通河就可以到達阿爾泰山西部的平原地帶。從位置和環境看，這個地區是阿爾泰山的腹心地帶，既容易和各個地區保持聯繫，同時又相對封閉，保持安全的環境（圖五）。



圖八 巴沙達爾、圖埃克塔和巴澤雷克墓地墓葬形制比較圖

在這個大的山谷中，分布着很多規模宏大的墓葬群，墓葬大致呈南北向鏈狀分布，略呈東北—西南方向，每個墓地都有大中小三個等級的墓葬，大墓直徑均 60 米至 100 米，可以認為是巴澤雷克文化的一個國王谷。其中烏爾蘇爾河分布的著名墓群有圖埃克塔墓地和希別墓地。烏爾蘇爾河的支流卡拉庫爾河分布着巴沙達爾墓地。1950 ~ 1954 年魯金科在卡拉庫爾河附近的巴沙達爾和圖埃克塔村各發掘了兩座墳塚，其年代屬於公元前 6—前 5 世紀（圖五、圖六、圖七、圖八）。圖埃克塔墓地中最大一座直徑超過百米，墓穴也非常大，可惜被盜掘。值得注意的是，圖埃克塔墓地中的鏈狀分布大墓西南方向剛好正對着烏爾蘇爾河河流在這個谷地最大的轉彎之處，也正好冲着對岸山脈突出來的一條山脊，這應當是當時的人有意為之，應當有特別的含義。

巴沙達爾墓地的墓葬規模宏大，而且封堆較高。出土的器物規格較高，有貼金箔的木雕鷹、貼金箔的馬具、貼金箔的羊角形馬冠、包金片的各類器物、雕刻動物紋的大木棺等。從迄今出土文物的等級看，屬於巴澤雷克文化最高等級，因此，以巴沙達爾墓地為核心的烏爾蘇爾河河谷地帶，應當是巴澤雷克文化的國王谷之一（圖七、圖八）。

四、公元前第一千紀南西伯利亞早期遊牧王國的勢力消長、 威權物與黃金消費

南西伯利亞三個國王谷中，阿爾然國王谷時代最早，時代約為公元前 9—前 6 世紀，巴澤雷克文化和塔加爾文化的國王谷時代主要為公元前 6 世紀以後，巨塚集中為公元前 5—前 3 世紀。也就是說，根據現在的發現看，最初在阿勒泰—薩彥嶺為核心的南西伯利亞地區只有一個中心，就是以三道海子文化為代表的早期遊牧王國，而且大墓非常集中，僅見于烏尤克谷地。墓葬為東西向線性排列，相互之間相隔較遠，一般為 3 公里左右。公元前 6—前 5 世紀之後，這個地區可能衰落，繼之而起的是薩格利文化和昌德曼文化等，這些文化還沒有發現規模巨大的墓葬和墓群。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爾文化和阿爾泰山地區的巴澤雷克文化此時開始興盛。分別出現了薩貝克和烏爾蘇爾兩個國王谷。



圖九 南西伯利亞三個早期遊牧文化的短劍、管釜啄戈、箭箠和箭鏃比較圖

塔加爾文化的形成相對獨立，開始較早，但早期社會分化尚不明顯，在公元前 10—前 8 世紀的巴伊諾夫期，墓葬還保持着卡拉蘇克文化的特點，墓葬較小，用 1 米高的石板圍築，有時四角用高 1—2 米的石板。一個墓一個墓室，埋一人。公元前 8—前 6 世紀的波德格爾諾夫期，墓葬仍然規模較小，但出現幾個墓相互連接起來的現象，石圍中間有 1—2 個墓室。木槨漸漸代替石室，單人墓仍然普遍，但多人合葬墓開始增多，墓道成爲多次合葬的入口。塔加爾文化的大塚開始於公元前 6 世紀以後，大致南北鏈式排列，但依地形呈西北—東南排列，大塚之間相距幾百至一千米左右，谷地相比較而言，是半封閉的。

巴澤雷克文化的形成可能和三道海子文化有一定關係，從邁埃米爾墓葬發現的蜷曲動物形象看，和阿爾然墓地的發現很接近，而且墓地位置靠近別列爾，也就是新疆阿勒泰地區和哈薩克斯坦東北角，另外阿爾然 1 號塚使用獨木棺的做法可能被巴澤雷克文化所繼承。因此，巴澤雷克文化可能是在當地文化的基礎上受到三道海子文化公元前 8 世紀擴張影響形成的，巴澤雷

三道海子文化	阿爾然 1號塚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small;">俄罗斯阿爾然1號塚</p>
	阿爾然 2號塚	
塔加爾文化		
巴澤雷克文化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small;">俄罗斯阿爾泰山巴沙德勒2号墓木棺板</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small;">俄罗斯阿爾泰山巴澤雷克墓</p>	

圖十 南西伯利亞三個早期遊牧文化最重要的威權物及藝術主題比較圖

克文化獨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形成的時間應當要晚一些，可能為公元前7世紀，真正形成自身的特點，應當以公元前6—前5世紀巴沙達爾墓地為代表，鷹和虎成為這個文化最受推崇的動物。具有巴澤雷克文化特點的鷹頭+羊/鹿角+驢/馬身的格里芬形象的流行應當是公元前4世紀以後。

從墓葬分布密度、規模看，巴澤雷克文化的中心似乎一直在阿爾泰山區中部烏爾蘇爾河及其支流卡拉庫爾河流域，代表墓地是巴沙達爾墓地、圖埃克塔墓地和希別墓地，這些大塚比較嚴格地遵循南北向鏈式分布，而且大塚之間相隔很近，均在五十米之內。可能由於山脈的阻隔，巴澤雷克文化社會較為鬆散，晚期在若干個地區都有高等級的墓葬，比如公元前4世紀以後，巴澤雷克墓地、別列爾墓地、烏闊克谷地和烏蘭德瑞等都發現高等級的墓葬，並且隨葬豐富的器物。2014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哈巴河縣喀拉蘇墓地也發現高等級的巴澤雷克文化墓葬。但從這些地區的墓葬規模看，還是沒有烏爾蘇爾河流域的巨大和密集，可能屬於地區性的首領。巴澤雷克文化人群有可能是西方文獻中守衛黃金的“格里芬”，哈薩克斯坦東北角地區、新疆阿勒泰地區生活的巴澤雷克文化人群在漢文文獻中被稱為“呼揭”。

這些國王谷經過發掘的高等級墓葬並不多，而且在歷史上盜掘嚴重，罕見保存完整的墓葬，我們只能通過一斑而窺全貌。這三個文化都具有明確顯示其文化特質、宗教信仰、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和王權的威權器物或者藝術主題。三個文化都相同的威權器物是以管鑿斧、短劍、弓箭為代表的武器，以及各式腰帶、馬具、銅鏡和銅鍍，最高等級的均製作精美，甚至用黃金製作或者裝飾，禮儀的功用超過實用的目的（圖九）。就動物風格藝術而言，三道海子文化是墊蹄尖佇立金鹿、蜷曲或者垂足雪豹、垂足野豬的器物或者紋樣，還有圓錐狀金耳墜、金項圈、金柄木勺和鍍形金器。塔加爾文化是裝飾站立圓雕山羊的鐘形權杖首。巴澤雷克文化早期是鷹和虎，之後是各種造型格里芬的器物 and 裝飾紋飾（圖十）。除了物質資源、人力、軍事、謀略外，這些器物和藝術主題都成為草原統治集團統治不同人群重要的精神資源和軟實力，在鞏固王國內部的穩定團結和對外擴張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早期遊牧王國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支柱。

從已有的發現看，就使用黃金的特點來看，真正大量使用黃金的是圖瓦烏尤克阿爾然國王谷的首領們。在第一個時期，可能黃金的使用還不是特別奢侈，阿爾然1號塚墓中殘存一些文物，有金器，比如打孔的金箔片、綠松石金耳墜、金串環項鍊、金圓泡、金項圈、包金竹節棒狀銅扣等。最有代表性的藝術主題蜷曲狀的雪豹牌飾主體是銅。當然，缺少黃金器也可能是由於主墓室的大量金器已經被盜。從2號塚的發現看，顯然，他們就是當時歐亞草原重要的黃金消費群體，最有代表性的器物，墊腳尖金鹿、雪豹、野豬和圓錐狀耳墜都是用純金製作，男女墓主都有黃金打制的金項圈和腰帶，戰斧和短劍均為錯金裝飾，等等。塔加爾文化迄今發掘和徵集的文物中，尚沒有大量的純金器物，主要使用金箔，晚期作為權力象徵的鐘形權杖頭，大多是青銅質，個別是鑲金的器物，不過缺少高等級的黃金用品也可能是由於發掘過的大墓均被盜。巴澤雷克文化的人群顯然喜歡黃金製品，但是他們非常經濟地使用這種貴金屬，先用木

頭、皮革、骨頭、動物角等材料雕刻出需要的器物，再使用金箔和漆來裝飾重要部位或是特別的器物，即使製作他們最有代表性的藝術主題格里芬，也是如此（圖十）。希羅多德《歷史》中記載守護着阿爾泰山黃金的是格里芬，即用鷹首獸身的神獸來命名控制阿爾泰山金礦開採和貿易的山地部落。由於阿勒泰西南山區是黃金礦產資源豐富的地區，阿勒泰墓葬中出土大量的格里芬造型的器物，所以創造巴澤雷克文化遺存的古代人群可能就是傳說中的格里芬。從節約用金的角度看，比較符合其壟斷開採、經營黃金貿易的角色。從出土文物看，巴澤雷克文化晚期和波斯關係密切，波斯帝國使用的部分黃金有可能是巴澤雷克文化的人群所提供。波斯的黃金被亞歷山大大帝掠走，希臘文獻中沒有斯基泰人搶奪他們黃金的記載。因此，除了高加索等地區，斯基泰人的黃金也可能來自烏拉爾山和烏拉爾河、天山和阿爾泰山地區。^[26] 應當說，歐亞草原斯基泰時期大部分地區的黃金可能主要來自以上這些地區，其中阿勒泰是最重要的產地。

在公元前 5 世紀以後，捨得使用黃金的，主要是巴澤雷克文化以西的人群，首先是西伯利亞寶藏、也就是彼得大帝收藏的主人，他們使用的金飾牌，全為黃金製作，大氣精美，堪稱草原藝術珍品。據俄羅斯學者推測，這些遊牧人很可能生活在新西伯利亞至齊桑泊之間的草原及山地，這裏倒是非常接近阿勒泰盛產黃金的地區。俄羅斯考古學家楚古諾夫在巴爾瑙爾市西南靠近哈薩克斯坦邊境線 40 公里的一個叫葡格瑞地方發掘了大型土塚墓，墓葬位於山前的平原地帶，槨室由石頭砌成，還有墓道，出土了木乃伊、小的武士木偶、金箔片，還有漆器，時代可能為公元前 5 至前 2 世紀，文化屬於開明斯克文化，這些墓有可能是西伯利亞寶藏的主人。值得今後關注。還有就是著名的薩爾馬泰人和斯基泰人，在這些遊牧人的墓葬中都能發現大量黃金製作的器物。從伊塞克金人墓的發現看，塞人也是捨得使用黃金的遊牧部落。除了草原南部農耕為基礎的國家外，草原上主要就是這幾支遊牧人大量使用黃金來製作動物風格的藝術品以及各類容器。當然，塔加爾文化和巴澤雷克文化的首領們也可能使用純金的大件器物，迄今沒發現，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是迄今尚未發現，其次可能在古代和 18 世紀已經被盜掘並熔毀了。

結 語

南西伯利亞地區和中國、蒙古和哈薩克斯坦山水相連，是歐亞草原重要的區域之一。通過對這個地區公元前第一千紀三個最為顯著的考古學文化中最高等級的墓地的初步分析，可以發現，這個地區在整個歐亞草原社會經濟遊牧化、社會結構複雜化的進程中，處於較為領先的地位，而且自成體系、獨具自身特點。與北高加索地區、黑海北岸地區相比，並不遲延和落後。

這些王族墓地選址均十分講究，都位於文化分布最為核心的安全之地，基本都處於封閉或半封閉的谷地之中，和周圍景觀融為一體，稱之為“國王谷”，名副其實。墓地基本遵循線性布局，三道海子文化大致遵循大範圍東西向鏈狀分布，塔加爾文化大致為南北向鏈形片狀分

布，巴澤雷克文化則為緊湊型的南北向鏈狀分布。首領家庭的墓葬規模宏大，有中、小型的墓葬陪伴周圍。墓葬形制結構均較複雜，都有大型木構的槨室。隨葬器物類別多、器類全、質地高檔珍貴，多使用黃金製作器物或者金箔裝飾器物，大多出土反映本文化特色、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器物和裝飾主題，動物風格藝術主題在其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些器物或者是藝術主題成為早期遊牧王國最強有力的文化因素，維護着王國的強勢存在，在周圍的文化中廣泛傳播。三道海子文化、塔加爾文化和巴澤雷克文化的興衰還有早晚、東西之分，加上公元前2世紀早期匈奴的擴張，反映了南西伯利亞地區公元前第一千紀軍事、政治和文化的互動和勢力中心的變遷。

對南西伯利亞這些早期遊牧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認識，將會促進對其周邊地區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研究，比如新疆和中國北方長城地帶。在這樣廣闊的背景中，來認識新疆以及中原這個時期的歷史就會更加深入全面。在這些發現和研究的基礎之上，將為今後在圖瓦、蒙古中西部以及阿勒泰地區尋找大月氏王族的墓地提供重要的經驗。

後記：寫作本文是因為兩次難得的實地考察經歷。2012年7月23日—8月7日，西北大學的王建新和張良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呂恩國、北京大學的陳建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郭物，到俄羅斯圖瓦、米努辛斯克、新西伯利亞、聖彼德堡和莫斯科等地進行為期15天的學術考察。張良仁在《中國文化遺產》2013年第2期以《俄羅斯考古訪問紀行》一文介紹了我們的這次學術活動。

2013年8月31日至9月7日，西北大學的王建新和張良仁、南京大學的水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呂恩國、北京大學的陳建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郭物，赴俄羅斯阿勒泰邊疆區和阿勒泰共和國等地進行為期7天的學術考察，並參加了阿勒泰國立大學在巴爾瑙爾市召開的“歐亞大陸考古重要問題的研究方法”國際研討會。通過這兩次學術考察，我們基本對本文所論地域分布的三個文化有了感性的認識，原來積累的一些知識因此成為了經過實踐的經驗。在考察的過程中獲得很多原來光靠讀文獻無法感知的認識。由於這個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廣受矚目並且同中國古代文化關係緊密，同時由於各種原因，中國學者親自到南西伯利亞進行實地考察較為困難。本文的目的就是想把這些考察所獲寫出來，把個人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新認識分享出來，希望拋磚引玉，推進相關研究更上一層樓。

在此，感謝張良仁教授為組織兩次學術考察活動付出的心血，同時也感謝俄羅斯各個學術機構及其專家對我們考察活動熱情幫助和大力支持，最後感謝同行前輩、兄長們對我的幫助。

注释

[1] L Legrand. Sophie, “The emergence of the Scythians: Bronze Age to Iron Age in South Siberia, The emergence of the Karasuk culture”, *Antiquity* 80 (2006), pp.843-879.

- [2] E.Gringmuth-Dallmer, “Kulturlandschaftsmuster und Siedlungssysteme”, *Siedlungsforschung. Archäologie-Geschichte-Geographie*(1996), Bd. 14, pp. 7–31.
- [3] 狄宇宙著, 賀巖、高書文譯:《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年, 第38頁。
- [4] 郭物:《三道海子文化遺存初論》,《歐亞學刊》第七輯, 中華書局, 2007年。
- [5] A.D.Grach, “The historical-cultural population of the early Scythian epoch in the Central Asia”, *Archaeological Journal of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1983),23, pp.30-42 (in Russian).
- [6] A.Y. Alekseev, N.A. Bokovenko, Y. Boltrik, K.A. Chgunov, G. Cook, V.A. Dergachev, N. Kovalyukh, G. Possnert, J. van der Plicht, E.M. Scott, A. Sementsov, V. Skripkin, S. Vasiliev, G. Zaitseva, “A chronology of the Scythian antiquities of Eurasia based on new archaeological and 14C data”, *Radiocarbon* 43 (2001), pp.1085-1107.
- [7] Konstantin V. Čugunov, Hermann Parzinger, Nagler, Anatoli, *Der Goldschatz von Aržan, Ein Frstengrab der Skythenzeit in der sdsibirischen Steppe*, Schirmer/Mosel, 2006. Konstantin V. Čugunov, Hermann Parzinger und Anatoli Nagler,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grab Aržan 2 in Tuva*. Archäologie in Eurasien Band 26, Steppenvölker Eurasiens Band 3,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Mainz, 2010. 本文所用阿爾然 1 號、2 號塚的圖片均采自此書。馬健:《公元前 8–3 世紀的薩彥——阿勒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歐亞學刊》第八輯, 中華書局, 2004。楊建華、張盟:《阿爾然大墓在歐亞草原早期鐵器時代的作用——兼論中東部文化的分界》,《邊疆考古研究》第 12 輯, 科學出版社, 2012 年, 第 221–227 頁。楊建華、包曙光:《俄羅斯圖瓦和阿勒泰地區的早期游牧文化》,《西域研究》2014 年 2 期。
- [8] К.В. Чугунов, “Дискретность Постройки «Царских» Мемориалов Тувы и Их хронология Ранне скиф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Verantwortliche Redakteure Mitgl. Russ. Akad. V. I. Molodin Prof. S. Hansen ed, Terra Scythica, Materialien d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 «Terra Scythica»*(17.–23. August 2011, Denisov-Höhle, Altai), Novosibirsk Verlag des Instituts für Archäologie und Ethnographie der SA RAW, 2011. 青吉台大塚平面圖采自此注所引文章, 照片為郭物所攝。
- [9]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 年, 第 510 頁。
- [10] M.P.Gryaznov, *Tagarskaya kul'tura, Istoriaya Sibiri*, volume 1. Leningrad: Nauka, 1968.
- [11] N.A.Bokovenko, B. Van Gel, Zaitseva, L.M. Lebedeva and V.A.Sementsov. “K probleme khronologii rannetagarskikh pamyamikov Eniseya”, in Yu. Piotrovsky (ed.) *Stepi Evrazii v drevnosti I srednevekov'e*, The State Hermitage kniga 2: 19–22. Saint–Petersburg, 2002.
- [12] M.P.Gryaznov, South Siberia, Geneva: Nagel Publishers, 1969. Nikolay.Bokovenko, “The emergence of the Tagar culture”, *Antiquity*(2006), Dec 1.
- [13] S.V.Kiselev, *Drevnjaja istorija Juzhnoj Sibiri*, Moscow: Nauka, 189, 1951. M.P. Gryaznov, *Tagarskaya kul'tura, Istoriaya Sibiri*, volume 1. Leningrad: Nauka: 191, 1968. E.B.Vadetskaya, *Arkheologicheskie pamjatniki v stepjakh srednego Eniseja*. Saint-Petersburg: Nauka, 95, 1986. Марсадолов, Л.С. Большой

- Салбыкский Курган В Хакасии, Абакан, Хака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10.
- [14] M.P. Gryaznov, *South Siberia*, Geneva: Nagel Publishers, 1969, p.11.
- [15] M.P.Gryaznov, *Pervyi pazyrykii kurgan*, Leningrad, 1950, p. 90.S.I.Rudenko, *Kultura naseleniya Gornogo Altaya v skifskoe vremya*, Moscow; Leningrad, 1953, p.402.S.I.Rudenko, *Kultura naseleniya Tsentralnogo Altaya v skifskoe vremya*, Moscow; Leningrad, 1960, p. 359.
- [16] Y.F.Kiryushin, A.A.Tishkin, *Skifskaya epokha Gornogo Altaya*, Barnaul; Ch. 1: Kultura naseleniya v ranneskifskoe vremya, 1997, p. 232.Y.F.Kiryushin, N.F.Stepanova, A.A.Tishkin, *Skifskaya epokha Gornogo Altaya*. Barnaul; Ch. 2:Pogrebalno–pominalnyie komplekxy pazyrykskoi kultury, 2003, p. 234.
- [17] A.P.Borodovskii, E.L.Borodovskaya, *Arkheologicheskoye naslediyе nizhnei Katuni*, Novosibirsk, 2009, pp. 151 – 160.E.L.Borodovskaya, *Gornaya dolina nizhnei Katuni v epokhu paleometalla*, Cand.Sc. (History) dissertation.Novosibirsk, 2009, p.18.
- [18] V.I.Molodin, “ Issledovaniya Rossiisko-germansko-mongolskoi ekspeditsii na severo-zapade Mongolii letom2006 g”, *Rossiiskaya arkheologiya* 4(2007), pp. 42 – 50.
- [19] T.A.Chikisheva, D.V.Pozdnyakov, “Antropologiya naseleniya Gornogo Altaya v gunnosarmatskoiye vremya”, *Arkheologiya, etnografiya i antropologiya Yevrazii*, No. 3 (3),2000, pp.116–131.
- [20] N.F.Stepanova, “Kuyumskii tip pamyatnikov VIII–VI vv, do n.e”, *Skifskaya epokha Altaya*, Barnaul: Izd. Alt. Gos. Univ, 1986, pp. 79–81.
- [21] V.A. Mogilnikov,” Nekotoryie aspekty etnokulturnogo razvitiya Gornogo Altaya v rannem zheleznom veke”, *Materialy po arkheologii Gornogo Altaya*. Gorno-Altaysk: Izd. GANIIYAL, 1986, pp. 43–44.
- [22] N.A.Bokovenko, V.G. Moshkova, V.A. Mogilnikov “Osnovnyie problemy v izuchenii pamyatnikov drevnikh skotovodov Zapadnoi, Yuzhnoi Sibiri i Zabaikaliya”, In *Stepnaya polosа aziatskoi chasti SSSR v skifo-sarmatskoye vremya*. Moscow: Nauka, 1992, pp. 157.
- [23]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ed. *Preservation of the Frozen Tombs of the Altai Mountains*, Yasef Bay, 2008, p.17.
- [24] 馬健 :《公元前 8–3 世紀的薩彥——阿勒泰 : 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歐亞學刊》第八輯, 中華書局, 2004。
- [25] 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 London, 1970.
- [26] Esther. Jacobson,*The Art of the Scythians: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Cultures at the Edge of the Hellenic World*, Leiden: E. J. Brill, 1995, p.13.

The Landscape, Layout and Structure of the Imperial Kinsmen's Cemetery of an Early Nomadic State in Southern Siberia

Guo Wu

Southern Siberi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where nomadic societies originated on the Eurasian steppes. A few early nomadic kingdoms emerged in areas where the transhumance appeared earlier and developed rapidly,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thre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Sandaohaizi culture, Tagar culture and Pazyryk culture. These early nomadic kingdoms of the Eurasian steppe almost invariably chose relatively closed valleys for the cemeteries of their leader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selection of the royal cemetery site was in the safety zone at the heart of the cultural distribution, and in a valley harmonizing with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A cemetery was basically planned with a linear layout: the Sandaohaizi cultural layout was strung out along an east-west orientation, the Tagar cultural layout entailed a north-south chain distribution, and the Pazyryk cultural layout was a compact chain runni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kings' tombs were large-scale, accompanied by medium and small burials around them. The main tomb comprised a mound with a complex shape and structure and a large wooden "outer tomb chamber".

The burial objects were of various categories, including high-grade and precious gold items or gold foil adornments. Most unearthed artifacts reflect the ideology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among decorative themes animal style art themes played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role.

Those of Sandaohaizi culture include the standing gold deer, and the curled or standing snow leopard. Some implements feature boar patterns, and there are conical gold earrings, gold collars, and miniature gold cauldrons.

Those of Tagar culture include a decorative bronze mace head in the shape of a bell with a goat standing on the top of it, as well as artifacts in shape of the deer.

Those of early Pazyryk culture include the artifacts in shape of the eagle and tiger; various types of implements have griffins and other decorative ornamentation.

Three cultures have the same prestige goods including such weapons as axes, daggers, bows and arrows, and various types of belts, harness, and bronze cauldrons. These motifs on these objects include powerful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early nomadic kingdoms, also

widespread among surrounding cultu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Sandaohaizi, Tagar and Pazyryk cultures, with the early expansion of the Xiongnu in the 2nd century BCE, reflect the shifts in the centers of power in the milit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southern Siberia area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E.